



叶立群 总主编
吴履平

中国近代
教育论著丛书

舒新城

教育论著选 (上)



吕 达 刘立德 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

舒新城教育论著选

上册

吕 达 刘立德 主 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舒新城教育论著选(上下册)/吕达、刘立德主编.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叶立群、吴履平总主编)

ISBN 7-107-13993-2

I. 舒…

II. ①吕… ②刘…

III. 教育学—文集

IV. G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5045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沙滩后街 55 号 邮编: 100009)

网址: <http://www.pep.com.cn>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33.125 插页: 1

字数: 745 千字 印数: 0 001~2 000 册

定价: 52.20 元

《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

总 序

《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是《中国古代教育论著丛书》的继续,选辑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重要教育论著。这套丛书业已列为全国教育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目的在于:力图系统完整地搜集、整理、保存我国近代有价值的教育理论文献,以便于读者全面了解和研究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国近代各个历史阶段的主要教育思潮,以及不同流派的教育观点。

这套丛书注重选辑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各个历史阶段有代表性的教育论著,以反映当时的教育学术水平、教育思潮的趋势,以及教育流派的论争。选辑内容包括论文、演讲、书信、日记、序跋、教育改革建议、教育实验或调查报告,以及专著节录等。除尽量搜集已经公开发表的教育论著外,并大力访求未公开发表的遗文和手稿。有的教育家,虽已出版过选集或文集,亦重新选辑纳入丛书,以体现新的特色。

这套丛书按教育家立卷。各卷实行主编负责制。一般情况,一册即为一卷,但篇幅多者可以一卷分为几册;篇幅少者可以几卷合为一册。各卷由主编或特约专家撰写一篇前言,简要评述该教育家的教育事迹、教育思想及其贡献和影响。各卷卷首载有该卷作者的照片、手迹等,卷末附录该卷作者教育论文、专著、译文、译著的年表或目录。对于有些作者在 1949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代表性的教育论著,也可酌收几篇,列为附录。读者一卷在手,便可纵览全貌。

这套丛书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叶立群倡议的,他对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多次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并一直鼎力支持。教育学界、教育史学界和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给予了热情关注,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各卷主编和编者付出了辛勤劳动。对此,我们深表谢意。

原丛书总主编陈学恂教授为这套丛书总体计划的拟订和前期编审工作做出了奠基性贡献,我们对此深表敬意。由于陈学恂先生谢世,高航同志工作变动,本丛书编审委员会作了相应调整,由下列人员组成(按姓氏笔划为序):叶立群、田正平、吕达、吴履平、邱瑾、邵祖德,以叶立群(中国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全国教育学会理事长)、吴履平(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总编辑)为总主编,吕达(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田正平(杭州大学教授)、邱瑾(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编审)为副总主编。

限于水平,这套丛书的编、审工作还存在不妥和不足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为感。

《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编审委员会

1994年1月

本 卷 前 言

舒新城(1893—1960),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和辞书编纂家。湖南省溆浦县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初名玉山,学名维周,字心怡,号遁庵,又号畅吾庐,曾用笔名徐怡、怡等

—

1898—1902年,舒新城在私塾读书,先后学习了“四书”、《诗经》和《书经》等,并开始学作八股文和应制诗。1904年,一度失学,在商店做学徒。此后,时学时辍,除继续学习“四书”“五经”外,还学习《了凡纲鉴》和张之洞的《论说入门》等,并受到《新民丛报》的影响。1907年春,考入当地一家书院,对历史发生兴趣,阅读范缜的《神灭论》,反对崇拜鬼神。

1908年秋考入溆浦县立高等小学,开始接受新式学校教育。在课外自学《西学丛书》《皇朝经世文编》等,喜读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陈天华的《猛回头》以及《黄帝魂》,服膺民族革命学说。翌年11月,通过“小学教员检定”。1911年6月因宣传革命,被县立高小开除。之后,一度在友人开办的学馆里教体操和算学,开始了教师生涯。武昌起义前后,他在县城里的“自治研究所”学习,年底毕业。第二年初,到小学任教。1912年夏,考入常德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单级教员养成所,学习半年,开始相信“教育救国”“教育万能”。次年春,到长沙的游学预备学校学英文;6月,到武昌文华大学中学部暑期英文补习科学习。

1913年8月,考入湖南高等师范英语部。1915年夏,参加长江学生夏令营。1916年投书陈独秀,计划在《新青年》杂志开办专栏,以提倡社会服务和改良社会,并与同学陶菊隐等创办《湖南民报》。1917年春,兼任长沙兑泽中学音乐教员;同年夏,从湖南高师毕业,正式到兑泽中学任音乐和英文教员。大学期间,受伦理学教师杨昌济和教学法教师徐特立影响甚大。

1918年夏,脱离兑泽中学,开始教育研究活动,大量购买中文教育书籍;借到英文原版书如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桑戴克的《教育心理学》《教育学》等之后,读之如获至宝,遂有从事教育著述之志。同年,湖南基督教教育联合会举办全省教会中小学教师暑期讲习班,舒新城应邀担任教育学和心理学主讲教师,大受教会教育界欢迎。接着,舒新城又应邀到教会办的长沙福湘女学任教育学科教师;同时受聘为基督教青年会社会服务部干事,负责推广教育,并担任长沙省立一中音乐教员,还加入了华中基督教联合会长老会。1919年春,任福湘女学教务主任,兼该校师范科教育学和心理学教师,又兼讲中国历史。大量研读杜威、桑戴克、孟禄等的著作,进一步坚定教育救国的信念。五四运动爆发后,舒新城动员学生参加湖南省学生联合会、长沙女学生联合会等进步社团,对女学进行中国化的改革,鼓励学生阅读进步书刊《新青年》《星期评论》等,组织学生到平民小学实习;并利用历史课,联系现实,讲述国际国内形势,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10月,针对教会学校的弊端,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我于教会学校的意见与希望》一文,引起长沙教会教育界的严重不满,遂被迫辞职,并脱离长老会。

1919年11月,在长沙创办《湖南教育月刊》,任总编辑,以“研究我国教育应采之宗旨,介绍世界教育之思潮,批评旧教育之弊端,商榷新教育之建设”为方针,毛泽东、杨树达等为重要撰

稿人。舒新城还分别致函文教界名流陈独秀、胡适和张东荪等，说明办刊的艰难，请求给予支持。同时，舒新城还给《体育周报》《北洋时报》《新中国》等报刊撰稿。1920年4月，《湖南教育月刊》出至第五期时，由于军阀张敬尧的胁迫而停刊。随后，到上海谋生，结识张闻天、恽代英等。7月，受聘担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育科主任，主讲教育学和心理学，并与毛泽东、匡互生等倡导进行教育教学改革（毛泽东此时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小学部主事）。1920年10月29日，湖南省学生联合会举行欢迎来湘讲演名流大会，杜威、蔡元培、舒新城等在会上均有演说。本年，舒新城欲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科深造，函请胡适帮忙向北高师校长推荐，后因故未果。

二

1921年7月，应张东荪之约，到上海吴淞，任中国公学中学部（后易名为吴淞中学）主任。他邀请朱自清、先光潜等到校任教，并开男女同学之先河，推行选科制和能力分组制实验。此项实验引起旧派教师不满，学校在10月爆发风潮。舒新城到北京请校长处理风潮，顺便考察了京、津、宁等地的教育。11月，风潮平息，继续实行选科制度。他积极参与学制改革运动，1922年初，发表《中国学制问题》《对于新学制草案本身的讨论》等论文，同时，认真研究了道尔顿制，认为该制的自由合作精神，可以解决学科制和年级制的许多问题。于是，力排众议，从10月起，与常乃德等在中国公学中学部进行道尔顿制实验。他撰文宣传道尔顿制的优点，并编辑出版有关该制的图书多部，在全国名噪一时。本年，被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指定为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中学课程委员会七名委员之一。翌年1月，因试行道尔

顿制与学校当局意见分歧,遂被迫辞职。

1923年2月,应东南大学附中主任廖世承之邀,到南京出任该校研究股主任,配合廖世承,继续实验道尔顿制,同时在江苏省立一中兼课,并专门在东南大学开办的暑期学校讲授道尔顿制,还在上海、浙江、江苏、湖南等地做关于道尔顿制和教学法的演讲。11月,由恽代英等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积极参加该会的活动;12月,与陈启天、吴俊升、杨效春、曹乌等召开少年中国学会第三次年会,会议通过了以舒新城为主拟订的《本会建筑会所与创办学校计划书》,规定办学的目的为“实现本会之宗旨,创造中国的教育”,但因时局纷扰,未能实现。1924年4月,结束在东南大学附中担任的课程,随后,用两个月时间,自费考察了芜湖、安庆、宁波、白马湖、绍兴、杭州、嘉兴、上海、徐州等11个地方的中等教育,参观了35所中学,并应邀发表了一些演讲。7月,与杨贤江、朱自清等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大会。

1924年10月,应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之邀,溯江而上,到四川出任该校教育学教授,开设中学教学法、现代教育方法、教育心理学三门课程。经常进行公开演讲和教育调查,收集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本年,又发表了大量论述道尔顿制的论文。1925年6月,因学校发生风潮,被迫离开成都,返回南京,从此结束专职教师生涯,对新教育运动进行反思,以研究近代中国教育史为主,开始了专门的研究著述生活。7月,与恽代英等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第六次年会,一度当选为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委员,并曾列名参与发起创办《醒狮》周报和“国家教育协会”。

1926年,为筹措研究资金,整理历年讲稿出版。开始邀集同学、学生、旧友并聘抄写人员共8人,组成工作班子编辑辞书。本年秋,与余家菊等合编《中国教育辞典》,用原工作班子进行,

他负责教育史、教学法、教育心理学等的编辑,1927年完稿。

三

1928年4月,应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之聘,主持续编大型工具书《辞海》,率工作班子在南京工作。5月,大学院教育部召开全国教育会议,舒新城向大会提交议案。10月,率工作班子迁往杭州。次年2月,在《教育杂志》上发表《致青年教育家》,引起教育界激烈争论;1930年1月,由杭迁沪,正式进入中华书局,任编辑所所长,兼图书馆馆长。他领导的《辞海》编辑班子全部并入中华书局,改组为中华书局编辑所字典部。舒新城把自己历年搜求的七千余册教育图书全部捐赠给中华书局图书馆。在陆费逵、舒新城主持下,中华书局编辑所编辑出版了一大批教科书和学生课外读物,并加紧《辞海》的编纂,又出版百科丛书、世界文学名著和国防丛书,重印聚珍仿宋版《四部备要》,影印《古今图书集成》,还创办《新中华》第一批期刊,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业务蓬勃发展。其后,舒新城还兼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暨南大学、沪江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在中华书局开办“函授学校”,兼任校长,编印函授教材。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舒新城与刘济群合编《淞沪御日战史》,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七七”事变以前,舒新城常常代表中华书局,往来于沪宁之间,主要任务是到中央文化委员会和教育部,与当局研究讨论关于准备抗战的文教政策问题。“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上海沦为战场,他一方面恪尽职守,与书局同仁计划教科书供应问题,另一方面,仍参加上海各种文化教育活动。1935年2月,与蔡元培、陶行知、邵爽秋、叶圣陶、巴金等发起推行简体字。翌年2月,又与黄炎培、郭

秉文、陈鹤琴等各界人士及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团体，共同开会，庆祝蔡元培 70 大寿、柳亚子 50 大寿，发起组织征集论文、诗词、绘画，编辑出版《蔡柳二先生寿辰纪念集》。1936 年 9 月，毛泽东致函蔡元培、舒新城等“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阐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7 年 5 月，应“救国通讯社”常务理事黄炎培之请，与张元济、王云五等出任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救国通讯》杂志顾问；7 月 28 日，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与蔡元培、张元济等一起当选为协会理事。1937 年 11 月，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先生赴港，舒新城受命代总经理，主持局务。同年，《辞海》正式出版发行。1938 年，上海成为“孤岛”，中华书局遂决定裁员以待后图，舒新城奉命执行裁减计划。1940 年冬，南京汪伪政权在成立前，大倡“和平”谬论，欲拉拢舒新城参加投降卖国活动，被舒新城拒绝。不久，舒新城赴港，1941 年初，他又因书局事暗中往来港沪多次。同年 7 月，舒新城在沪生病，旋即开始了在上海困居的苦闷生活，辗转数年。1943 年春病情加重，几至不起。舒自行钻研医药卫生书籍，并逐渐实行，后来身体好转。1944 年夏，长沙沦陷后，他以死相拼，拒绝返湘出任伪职。

抗战胜利后，舒新城继续主持中华书局编辑所工作，怀着满腔热忱，大力推行电化教育，计划利用广播和电影来普及教育。1945 年 11 月起，主持购置了外国的科学教育影片二百余部，并初步自行摄制了一些教学影片。1946 年上半年在之江大学兼课，后又在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兼课，并为上海市教育局、青树基金团主持电化教育工作和健康教育辅导事宜。1947 年 1 月，主持复刊《中华教育界》杂志，任杂志社社长，在复刊号上发表《十年来我的教育见解的递变》。3 月，参加由中国电影照相器材供应公司主办的“第一次电化教育座谈会”，进一步强调发

展电化教育,并应邀主持制作有声教育电影和幻灯片,在中华书局设立教育电影室。他还发表电化教育的系列文章,并最终集为《电化教育讲话》一书正式出版,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电化教育专著。5月,陪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参事胡懋仪(Peter Hume)参观中华书局编辑所的图书馆、实验室、电影室等,并与胡懋仪讨论各项教育问题。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召开“远东基本教育会议”,舒新城应邀撰发多篇论文,并为配合会议,举办了“中华书局图书馆基本教育图书教具展览”。同时,主持出版了《辞海》合订本。1948年,舒新城暗中聘请俄文编译人员,又通过茅盾等人从国际书店进口大量俄文书籍,准备了全套俄文字模,另又以《新中华》杂志为阵地,约集一批进步作家,编译进步书稿。本年秋,与老同学陶菊隐和许彦飞(中共党员)一起,为地下党提供联络点,配合地下党的工作。翌年初,舒新城再次代理中华书局总经理一职。

四

1949年上海解放后,舒新城继续担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图书馆馆长,并担任中华书局业务管理委员会委员、劳资协商会议资方代表及派往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股东代表、上海市书业公会代表、海外课本联合编刊社社务委员等职。1950年,作为上海出版界的代表,赴京参加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在会上提出很多建议。1953年7月以后,舒新城虽已从中华书局退休,但仍担任中华书局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中华书局董事、上海市教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上海市业余广播学校校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

会教育组成员、第一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市无党派民主人士召集人等职。1957年6月,舒新城设计了《一个帮助初中高小毕业生继续就学的具体方案》,经上海市教育局组织有关单位讨论,《人民教育》杂志刊载了本方案,还配发了编者按,认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酌量试行”。本年,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他建议由国家设立百科全书出版社,专门出版大型辞书。同年9月17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舒新城,舒新城又提出修订《辞海》的建议,深得毛主席赞许。1958年5月,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成立,舒新城任主任。1959年春,《辞海》编辑委员会成立,舒新城任主任委员。1960年春,《辞海》初稿基本完成。1960年11月28日,舒新城因重病逝世,享年68岁。11月30日,公祭仪式在上海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及陈毅、李维汉、黄炎培、陈叔通等送了花圈和挽联,陈丕显等参加了公祭仪式。

五

舒新城的教育思想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学制改革**。舒新城踊跃参加1922年前后的学制改革大讨论,对壬子癸丑学制提出批评意见。在《中学学制问题》一文中,他认为,中学四年分段,以普通教育升学为目标,已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必须彻底改革,他明确主张,中学教育要克服年限过短的弊端,做到“升学与职业教育双方兼顾”。其改革学制的基本设想是:延长年限,在分科教学的总前提下,实行学科制和选科制。在新学制颁布之前,他大胆把自己的主张在执

教的学校里付诸实践,成为学制改革最有影响的先驱者之一。1921年11月,以普通中小学教育六三三分段为重心的新学制草案正式公布,因该草案与舒新城学制改革的一贯主张相合,所以他随即发表《对于新学制草案本身的讨论》,对草案大加赞许,并一一评析,指出,“这次新学制系统中等教育段与我素怀相合”“最满意者,中等教育之采用选科制与中学校延长为六年,于后三年分科,把职业教育、升学教育都能顾到”。他还提出总结书院自由探讨的精神,建立以“三馆”为重心的教育制度,即在广大乡村和集镇,增设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延请指导员指导不能入学校的儿童和青少年,“辅助其自修各级教育”,重在自学。

第二,关于**课程改革**。舒新城是著名的中等教育专家,作为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指定的“新学制中学课程委员会”七名委员之一,他积极参与新学制课程标准的大讨论,对中学课程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精辟的见解。1922年,他历时两月,撰成长达5万字的论文《中学校课程的研究》,具体阐述了他的课程改革思想。他提出了课程改革的“一般原则”,这就是:1.“课程是达教育目的之一种方法”;2.“课程是随着教育的变迁而变迁的”;3.“课程的内容于适合现代生活之中要有打破现实生活的精神”;4.“课程应具有达到教育目的的简捷性”。他又从“一般”深入到“特殊”,认为,处于青年前期的中学生,身心变化很大,中学课程改革应有“特殊原则”,这些原则是:1.“中等教育的目的在兼顾普通文化和职业教育,课程的内容也应当两方面顾到”;2.“中学生身心发育正盛,思想变迁甚速,课程科目应有选科以应其需要”;3.“中学学生活动力强,课程材料应选择与日常生活切近者,使与环境多有接触”;4.“中学学生感情特盛,课程的科目宜多,方面宜广,以丰富其生活使之社会化”;5.“中学教育非以研究纯粹科学为目的,课程的排列宜多心理的少论理的”;6.“中

等教育要注重学生自动,故授课时间每周最多不得超过三十小时”。根据这些原则,舒新城拟定了崭新的中学课程体系。可以说,他的课程改革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三,关于**教科书编写**。舒新城认为,编写教科书时必须明确“科学与学科”“一般图书与教科书”的严格区别。他主张,教科书“要将科学的系统和研究者的态度同精神,去迁就读者的能力、时间,并要顾及读者读了此书以后的效用”。在选择材料方面,他指出编写的基本原则是:“教科书重在科学的应用,不重在科学的系统”,要以学生日常生活需求为转移。这一观点虽有忽视学科体系结构之嫌,但其强调教科书内容要“选择与日常生活切近者”的价值取向,是有积极意义的。他后来修正这个观点时说,教科书内容的选择上必须顾及“适用”和“精要”两条,就是说,“第一要明白科学的内容,第二要估定科学的价值”,即“把学科的必要的材料和教课的时间通盘算一番,然后按照时间的多寡、生活的需要,以估定这学科至少的精粹材料”。学科内容的选择和学生的需要都得到考虑。教材内容确定后,紧接着就是如何编排的问题。教材内容的编排,通常有逻辑法(主要按科学本身的逻辑体系组织教材),或心理法(主要按学生的心理需求组织教材);直线法(指一种内容在一个学段的学习过程中一次出现),或圆周法(指将同一内容在不同的年级教材中重复出现,螺旋上升)。这几种方法各有利弊,但舒新城认为:“要顾到学者的利益,教科书的排列自然以心理的和圆周的为好。”这与他“课程材料的排列宜多心理的少论理的”思想是一致的,虽有杜威实用主义教材心理化影响的印迹,但他重视学生内在的个性心理需求,是有可取之处的。在教科书内容的叙述方法上,他反对从概念原理出发的演绎法,主张用归纳法,从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实例中讲授科学。他在《编辑混合心理教科书的意见》中指出:

“教科书的叙述方法,也有两件事要留意,即(1)常识的,(2)归纳的。”他强调的归纳法,对培养学生的逻辑归纳能力和打破传统教育教条演绎的积习,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第四,关于**中学德育**。舒新城重视德育内容的创新。他将修身课改为伦理课,由“实践伦理”和“伦理原理”构成。前者包括清洁、合群、互助、勤学、容物、省克等日常生活规范的教育,后者主要阐述社会道德规范的基本原理。在学生训育方面,他主张实行自治制,但不赞成“议会式的学生自治办法”,而主张“教师辅导学生自治”。他根据“实践伦理”的德目编成《训育大纲》,设立学生自治会,以学校主任和专任教员为辅导员,与学生共同生活,实现在团体生活中增进思想品德的目的。他根据自己在中学任教多年的经验,撰写了《公民课本》,在教材中他设计了六个单元:团体生活、政治组织、经济生活、社会问题、国家关系、道德问题,主要阐明中学生必须了解的日常生活的伦理规范以及个人与团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等的关系。同时,他率先在中学开设人生哲学课程,并撰著了《人生哲学》课本,把人生哲学定义为“以科学实证为根据,研究人生的机体、活动、究竟、修养问题,而为意义与价值之探讨的学问”。他对中学德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主张以科学的精神和方法陶冶受教育者,以养成科学的人生观,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五,关于**教育史学**。舒新城认为:“要改进中国教育,非注意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不可。”他主张通过对教育史的研究,探索教育变迁的“线索与所变化的原因”,从而总结出“若干公例”,作为应付现实教育和未来教育问题的“南针”。在《近代中国教育史问题》一文中,舒新城在中国教育史上首次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探讨了教育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将近代中国教育史定义为“专述近代中国人的教育活动,求出其因果关系以供现代及后代

教育上之资鉴者”。该文明确地阐述了近代中国教育史的研究目的、对象和范围,强调了教育史的学科特性。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出于对中国新教育运动反思的需要,舒新城首先对近代教育史料进行了搜集整理。从1925年起,他编辑出版了多部教育史料书。其中《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是影响最大的一部。全书共计四册,以“经过事实现象者,叙述事变因果者,言论之代表时代思潮者,言论于实施上发生影响者”为编辑标准,1926年编成,1928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以后不断再版重印。新中国成立后,修订为上、中、下三册,易名为《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1961年第一版,1981年第二版。该书是治教育史者必读之书,其影响至今不衰。在搜集整理教育史料的基础上,他进行深入研究,发表了大量的教育史论文,编为《近代中国教育史稿选存》,并著成《近代中国留学史》《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华民国之教育》等。舒新城对教育史学、尤其是对中国近代教育史学的学科史论功不可没。

综上所述,舒新城生活在从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转变的伟大变革时代,他出身贫寒,苦学自励,与时俱进,先后担任过小学教师、中学教员和大学教授,在中华书局工作达30年之久,在教育图书和中小学教材的编辑出版、辞书编纂等方面有丰富的学识、经验和卓著的成就,在摄影和散文创作等领域也有一定成就。舒新城作为我国教育教学改革和实验的先驱、教育科学研究和著述的巨擘、近代中国教育史学的重要代表,为我国近代教育改革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教育事迹和教育思想,永远值得我们研究和學習。

编 者

2000年6月

于北京沙滩后街,京师大学堂旧址